

中国乡村考察报告



国家与家庭的互构

——河北翟城村调查

潘鸿雁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乡村考察报告

主 编 刘豪兴 副主编 陆宗寅



国家与家庭的互构

——河北翟城村调查

潘鸿雁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家与家庭的互构:河北翟城村调查/潘鸿雁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中国乡村考察报告)

ISBN 978-7-208-07677-8

I. 国... II. 潘... III. 家庭社会学—考察报告—定州市
IV. D6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04668 号

责任编辑 刘英红

封面设计 王小阳

· 中国乡村考察报告 ·

国家与家庭的互构

——河北翟城村调查

潘鸿雁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4 插页 3 字数 215,000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250

ISBN 978-7-208-07677-8/C·311

定价 25.00 元

《中国乡村考察报告》出版前言

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农民率先在农村进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解放了生产力,同时也解放了自己。在农业大发展的同时,农村的工副业逐步发展为主导产业,农民走上了致富道路,农村面貌日新月异。农村的昌盛,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城乡协调发展呈现了美好的前景。民富国强,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上升。盛世忧事,怎样保证国家长盛不衰,党、政府和人民共同关注着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认为这个“三农”问题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矛盾的聚焦点,是当今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最重大、最基本的问题。为解决这一历史和现实问题,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进行了或正在进行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农村税费改革和农村综合改革等一次又一次的社会变革和制度创新。这是明智的战略思考和实践。为反映我国“三农”在现代化进程的新情况、新特点、新问题、新趋势,记录和检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践与农民观念的变化,《中国乡村考察报告》丛书应运而生。

2002年10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探索性地出版了《中国乡村考察报告:乡镇社区的当代变迁——苏南七都》一书,得到了社会的认同,我们遂决定筹划以“中国乡村考察报告”为主题出版丛书。我们将这个计划向著名社会学人类学家费孝通报告,他十分赞同,希望扎扎实实地做好选题和调查研究工作,打好丛书出版的根基。他带头,为该丛书做了两件实事:一是将他1981年以来有关乡村考察的文章选编为《志在富民》一书,作为《中国乡村考察报告》丛书的一种;二是为《中国乡村考察报告》丛书写了《总序》。他在《总序》中说,计划组织出版中国乡村考察报告丛书,“这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社会学等学科发展的需要,是一件好事,我积极支持和参与”。他认为,“‘中国乡村考察报告’可以为社会学专业人才的成长提供一个舞台,坚持数年必有成效。丛书的出版可以打破常规,条件成熟可以同时出几本,也可以成熟一本出一本,要努力适时地反映不断变化的农村实际,提高考察报告的水平”。2005年4月24日,费孝通谢世,我们

将遵循他的遗愿,努力地做好《中国乡村考察报告》丛书的编纂出版工作。

《中国乡村考察报告》丛书是动态性的,计划5年,每年出版四五部。我们希望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的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共同参与,从实际出发,“以农民为本”,提供好的作品。认识中国社会,首先要认识中国农村社会。认识社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希望本丛书通过不同类型农村社区的研究或某一种社会经济现象的研究,为“逐步”、“接近”认识中国农村社会累积一些周密、系统、客观的资料和观点。认识社会,是为了改造社会。我们希望本丛书诸位作者在概括总结农民实践经验基础上提出的一些建议,能对实际工作部门的决策有所帮助。有比较,才有鉴别。我们希望从不同类型的研究中,既能认识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的个性、特殊性及其多样性,更能发现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的共性、普遍性及其一致性,为推动社会和科学的发展贡献一些理论知识。若丛书在理论和实践上能产生一些有较大影响的传世之作,将是学术界和社会发展的幸事。相信全国各地,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也就是东部、中部、西部的农村都会有一定的著作做出回应。

《中国乡村考察报告》丛书各书是独立的,有不同的类型,同一类型可能有不同角度的多本著作,认识和观点也可能是多样的。我们尊重各自的独立的见解,差异的见解相得益彰,这将有利于对中国农村社会认识的深化、提高,有利于社会科学的发展。

我们衷心地感谢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厚爱,将《中国乡村考察报告》系列丛书列为“十一五”期间(2005—2010年)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的“重大出版工程规划”之一。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及其上海人民出版社高度重视,为本丛书的出版制订了计划,提供了特殊的条件;各位作者积极响应,发扬团队合作精神,辛勤劳动,为本丛书提供优秀作品,我们谨致以谢意。读者和有关方面对本丛书的编纂和出版有许多期盼,这是对我们的鞭策和激励;我们当加倍地努力,随时倾听各方的批评与建议,改进工作,选好题,出好书。

《中国乡村考察报告》丛书主编

刘豪兴

2006年9月于复旦大学中心村

总 序

上海人民出版社在 2002 年推出了中国乡村考察报告的首本著作《乡镇社区的当代变迁——苏南七都》(刘豪兴等著),引起了社会的关注,认为中国乡村考察报告是一个好的选题,进而计划组织出版“中国乡村考察报告”丛书。这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社会学等学科发展的需要,是一件好事,我积极支持和参与。

我坚持把认识中国社会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方向和动力,但从哪里入手呢?我是从农村入手的,并一直以认识中国农村社会为社区研究的主体。我重视并坚持农村研究有主客观的多种原因,但主要的一个是由农村在国家中的地位决定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即使到了 21 世纪中叶,城市化水平达到 70%,16 亿人口中仍将有近 5 亿人口在农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农民、农业和农村即“三农”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要强盛,首先要使农村不断有大的变化,农民富裕起来过上好日子。中国基本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都植根于农村这个乡土社会。这是中国的国情。因此,我认为认识中国社会,认识中国人,首先要认识中国农村社会,认识农村经济,认识农民生活及其人生态度。只有认识农村社会,才能真正认识中国社会;也只有从中国农村社会的实际出发,才能科学地处理和解决中国城乡、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从上世纪 30 年代中期的广西大瑶山调查和江苏太湖边上的江村调查开始,我一直把研究农村作为己任,并为之奋斗了近七十年。但是,我还不能说,我已认识中国社会了,我只是向认识中国社会这个目标接近了一步。我这一辈子是在不断提出问题,进行实地调查,有所认识、有所发现,继而又在新的破题和调查中走过来的。认识无穷尽,脚步永不停。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变迁,对社会的认识不能停留在已有知识的

水平上。认识中国农村社会,需要数代人不懈的努力,需要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中国乡村考察报告”的陆续出版,有系统地把分散的、孤立的、不同类型的社区研究集中起来,将为比较研究,逐步接近认识农村社会、认识中国社会提供有益的帮助。

认识社会是为了改造社会,农村研究也就是为探讨农村发展的道路,促进农村的可持续发展,不断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尽一点力。为研究而研究,有损学术研究的社会责任,对社会毫无补益。急功近利,浮于现象,没有周密的、系统的、深入的考察和科学的分析,也难以提出有效改造社会的意见。1938年秋,我校对完《江村经济》(又名《中国农民的生活》)样稿后回国,辗转从英国回到抗战的后方——云南昆明,两个星期后我就一头钻进内地农村进行实地调查了。我主持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室学术群体在短短的几年中进行了多项调查、撰写了《禄村农田》(费孝通著)、《易村手工业》(张之毅著)、《玉村农业和商业》(张之毅著)、《芒市边民的摆》(田汝康著)、《内地女工》(田汝康著)、《昆厂劳工》(史国衡著)等多种报告。我在综合比较分析不同类型的农村研究后,写出了《乡土中国》和《生育制度》等理论著作。当年的环境条件很差,困难很多,但我们有一股劲,一股追求知识的劲。为什么会有这样一股劲呢?我们当时觉得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在抗日的战场上,我们能出的力不多。但是为了解决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我们有责任,用我们所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去认识中国社会。解决具体问题必须从认清具体事实出发。对中国社会的正确认识应是解决怎样建设中国这个问题的必要前提。我希望“中国乡村考察报告”的每一本书都尽可能有明确的意图,既可为认识中国社会和学科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资料和观点,又能为现实的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农村研究应有一定的范围,也就是要有清楚的研究单位。这个研究单位的选择因人、因地、因时、因财力而定。可以是一个村庄,或一个乡镇,也可以是一个县(市),或一个经济开发区。范围小些,便于操作,范围

大些,难度大,但说服力可能强些。中国乡村考察宜以村庄和乡镇为主,应有不同的类型。根据研究的需要和可行性,一个研究对象可以是比较全面的考察,如《江村经济》是对开弦弓村这个农村社区的社会结构及其生产、分配、交易和消费体系比较全面的描述。也可以是突出某个主题的深入考察,如我的《禄村农田》、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和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分别以内地农村的土地制度、手工业生产、商业活动和摆夷(即傣族 Tai)宗教活动等为研究对象,各有侧重的主题。

农村研究,可以采取多种方法,我经常采用并极力主张的是实地调查方法。实地调查又称田野调查,是社会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研究者直接深入社会、亲自观察人们的实际生活,通过不同形式的深度访谈获取研究资料。这样得到的资料一般是比较客观的、可靠的,经过科学的整理和分析,就可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科学的结论。可以说,实地调查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方法。从实求知,我学术活动的起点是实地调查,我学术道路的各个进程都伴随着实地调查,实地调查是我学术研究的基石。1978年,我获得第二次学术生命后坚持的仍然是实地调查。“行行重行行”,我对自己调查过的地方只要有条件,我都重新回访,不止一二次,可以是多次,江村我已是访问了26次。1984年9月,我第一次访问“苦甲天下”的甘肃定西,结下了不解情结,今年8月底我前往进行了第七次访问,看到了当地干部群众穷则思变,探索了一条以退耕还林为契机,发展生态经济治贫致富的路子。“故地重游”,我对调查过的地方的每一次重访都有新的认识。这种研究被称为追踪研究,也就是研究者本人或其他学者,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对同一社区或同一现象进行研究,从不同阶段的比较中深化认识。我紧紧追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一边调查,一边记录,提出了发展乡镇企业、发展小城镇、边区开发、区域经济发展等主张,为推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尽了一点力。理论联系实际,实地调查要有理论指导,实地调查获得的资料要进行理论概括,才能获得对社会规律性的认识。问卷调查是定量分析的基础,我赞同适当地采用,

但如果没有实地调查相佐,单一的问卷调查难免会发生认识上的偏差,难以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在实地调查基础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怎样相结合,我们的经验还不多,值得很好研究。

1979年春天,我国恢复重建社会学以来,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已基本确立。社会学对现实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出版了不少研究成果,为各级政府和实际工作部门的决策咨询提供了一批有益的意见。这些成绩来之不易,应当肯定。自然,我们也自觉地意识到,一百多年来,社会学在中国历经坎坷,先天不足,后继乏人,还有不少问题和困难。我国社会学远未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需要,如能上阵真正认识中国社会并在理论上有所建树的人还很少。社会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仍应是第一位的,但不能关在书堆里、爬在网上培养,应当在实地调查的广阔天地里塑造。“中国乡村考察报告”可以为社会学专业人才的成长提供一个舞台,坚持数年必有成效。丛书的出版可以打破常规,条件成熟可以同时出几本,也可以成熟一本出一本,要努力适时地反映不断变化的农村实际,提高考察报告的水平。

我的一个心愿,就是希望把认识中国社会的好经验、好传统传授给下一辈。长江后浪推前浪,我对中国社会学事业充满信心,盛世将是人才辈出的时代。中国乡村将更加繁荣,祖国将更加昌盛,农民的生活将更加美好。

费孝通
1980年

序

对广大农村地区的关注一直是我国社会学界的传统,早期的社会学家采用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或进行实地调查,或进行问卷统计,对当时的农村社会进行描述和做出解释。如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严恩椿、易家钺、潘光旦、陈长蘅等人按照实证社会学的方法原则开展了家庭人口问题研究;有李景汉、陶孟和、陈翰笙等人深入街头巷尾开展实地调查,通过问卷了解具体情况,并进行量化统计;有费孝通等人深入细致的社区调查,他们开创了中国社会学实证调查之风,将社会学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开辟了农村社会的研究传统,他们在中国社会学的学术史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在 21 世纪的今天,有志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事业的后起之輩,沿着前人的足迹,带着时代的气息,继续探索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现实问题。潘鸿雁的学术专著便是这样一部反映转型加速期中国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的作品。八十年前,中国早期社会学家李景汉先生在河北定县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并于 1933 年成书为《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全书以大量的数字资料,从地理环境、历史、政府机构、人口、教育、健康与卫生、农民生活、乡村娱乐、乡村的风俗习惯等 17 个方面对定县的基本社会概况进行了全面描绘,成为当时中国县区社会调查最详尽的文献,被当时学术界称之为“一部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对当代社会学考察的理论与方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八十年后的今天,潘鸿雁以写作博士学位论文的形式,参与我主持的以定州(定县)为参照系和追踪点的课题《华北农村八十年的社会变迁》,重返李景汉先生调查过的地方,捡拾遗迹,追踪变迁,从定州农村家庭关系变迁的角度,考察国家与家庭的互构进程,通过家庭变迁透视整个华北农村社会变化的一角。

作为我指导的博士生,潘鸿雁三年来坐在学术研究这条冷板凳上,勤勉不怠,孜孜以求,大量阅读社会学方面的书籍和文献,并多次下乡做实地调查,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对这些资料进行系统深入的整理、

分析和研究。这本书是她三年来潜心研究成果的结晶,本次出版,她又做了修改,从中可以看出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

全书以社会转型加速期定州农村非常规核心家庭为研究对象,结合定性性与定量的研究方法,从社会互构论的观察和研究视角,对户籍制度变迁与外出打工家庭策略相互作用下的定州农村非常规核心家庭关系的变化进行分析和解释。全书共分五章。第一章提出制度变迁(特指户籍制度变迁),为下章定州农村家庭制定外出打工策略提供了依据,由此拉开了国家与家庭互构的序幕。第二章论述了农民外出打工策略的实践过程。外出打工引起家庭结构变动,从规模与形态上看,家庭成员外出,尤其是外出的模式选择,直接导致家庭人数减少、规模缩小,家庭类型结构发生变化,非常规核心家庭成为一种重要的家庭形态,其特征是:具有血缘关系、并且在社会和经济上具有共同利益的家庭成员没有居住在一起;其家庭生命周期的特点是:在家庭发展的各个阶段,妻子是家庭的主要和固定成员,丈夫在大多数阶段都处于缺位状态。非常规核心家庭的存在,反映了家庭形态的多样化发展趋势,拓展了传统意义上学者对家庭结构的分类,改变了人们对家庭概念和性质的理解:经济支持取代传统的共同居住和生活,成为现代家庭存在和发展的一个物质条件,家庭的自我认同意识延续至今,成为家庭存在和维系的一个精神条件。第三、四章是全书的重点,主要是分析农民如何调适和建构适应于外出打工策略的家庭关系。非常规核心家庭是外出打工家庭策略实施的必然结果,同时也面临着内部关系的调适和外部关系的建构,调适和建构的原则是家庭整体利益至上,目的是为了能够更好地满足家庭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当然,在家庭策略实践的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有些是可预见的,有些是不可预见的。由此得出:家庭内部交往趋于形式化和理性化,出现角色紧张和冲突;家庭外部关系建构不再仅仅依据血缘关系,姻缘及地缘关系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互惠互利的等价交换原则日益彰显,因而体现了一种理性化、商业化的趋势。传统的人情关系发生变化,差序格局从伦理向人情利益并重的差序格局转变。第五章是全书的理论总结与对策思考。非常规核心家庭是农民适应制度变迁、外出打工实践的结果,由此引发的各种家庭问题及社会问题,对缓慢变革的户籍制度造成巨大冲击,对中国制度结构的进一步调整提出要求。制度变迁与家庭策略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这正反映了国家与家庭两大主体互构的过程。全书的理论深

度由此提升。最后,作者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提出了重建农村社区的解决思路 and 对策,希望通过加强社区与家庭之间的联系,用社区资本为非常规核心家庭提供情感支持、经济支持和各种援助,最大限度地减低农民的成本;强化社会政策对社区重建的支持,从政策和制度上解决非常规核心家庭的社会支持和社会保护问题。

我很高兴,作者将我们提出的社会互构论引入家庭社会学研究领域,把它作为自己论文的主要视角,提出国家与家庭互构共变。应用新视角研究新问题,这不能不使论文具有新意。对于家庭社会学来说,这是一种理论的探索和提升,也是一种现实内容的延展和丰富;对于社会互构论来说,则是一种实证的检验和应用的拓展。在这种意义上,作者也对社会互构论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除了本书作者,我的博士生中已有六七位,把我提出的几个社会学理论——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尤其是社会互构论,应用于以定州为代表的华北农村八十年变迁的方方面面,写出了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有的已经出版,有的即将出版。我认为,这样的师生学术互动是相互得益的,是富有成果的。

农民家庭稳定与否,是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关键,从而是构建中国和谐社会的关键。全书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观点新颖,是研究转型期中国农村社会家庭关系变迁的探索性作品,可以使读者对中国社会变迁获得深入全面的了解。全书配以多幅反映华北农民生产、生活实践的图片,使得本书更具生动性与可读性,既不失理论深度,又深入浅出。当然,如何把家庭关系这一古老而重要的家庭社会学话题,在新时代下赋予新的研究内容和观点、新的理论解释,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作者还需要努力探索。

郑杭生

2006年11月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心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及研究意义	1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的设定	5
第二章 家庭结构的变迁:非常规核心家庭	25
第一节 社会转型加速期定州农村社会的变迁	25
第二节 定州农民外出:“走向现代性”的家庭决策与实践	30
第三节 非常规核心家庭的结构	45
第三章 非常规核心家庭内部关系的调适	57
第一节 夫妻关系	58
第二节 亲子关系	92
第四章 非常规核心家庭外部关系的建构	114
第一节 互助互利的亲属关系	116
第二节 互惠互利的邻里关系	127
第三节 差序格局的现代内涵	149
第五章 理论总结与对策思考	157
第一节 制度的回应	157
第二节 制度变迁与家庭策略:国家与家庭的互构	167
第三节 重建社区支持的对策思考	174
参考文献	179
附录一 调查问卷	193
附录二 若干个案调查	198
后 记	207

Contents

Chapter 1	introduction	1
1.	The origin of the question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study	1
2.	Design of study ideas and methods	5
Chapter 2	The transformation of family structure: the unconventional nuclear families	25
1.	The change of Ding Zhou County under social transformation on acceleration period	25
2.	Going to work in cities for peasants in Ding Zhou County: “going towards modernity” of family structure and practice	30
3.	The structure of unconventional nuclear families	45
Chapter 3	Adjusting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of unconventional nuclear families	57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58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92
Chapter 4	Constructing the external relationship of unconventional nuclear Families	114
1.	The relationship with relatives in a practical way to maintain mutual help and mutual benefit	116
2.	The relationship with neighbors in a practical way to maintain mutual interest and mutual benefit	127
3.	The modern meaning of “ripples” pattern based on ethic	149

Chapter 5 A theoretical summary and reflections on

countermeasures	157
1.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157
2.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family strategy: inter- constructive between the state and family	167
3. Reflections on countermeasures of reconstructing the rural community	174
References	179
Appendix 1	193
Appendix 2	198
Postscript	207

第一章 导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形成了以户籍制度及与其相关的配套制度为标志的二元社会体制和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户籍制度的松动,我国出现了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他们往返于城乡之间,对城乡社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构成了我国社会结构新的一元。顺应这种形势,近年来社会学界对由此而来的农村问题、农民工问题的关注逐渐升温,相关的书籍文章举不胜举,然而却少有对农民工家庭进行系统研究的,这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契机。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及研究意义

一、问题的缘起

本书的研究源于一个课题:华北农村社会八十年变迁,这是基于对河北定州(原名为定县)的再调查。当我第一次到定州翟城村时,给我留下初步印象的是:那儿的家庭呈现出形式上的不完整,即大多数家庭只有女性、孩子,或老人在家。在以后多次下乡做调查及访谈时,这种印象加深:村里的男性季节性出去打工,春节前他们返回家乡与家人团聚,春节后又迅速流回城市,形成了一年两度的往返浪潮,家庭成员事实上处于两地分居的状态。

我惊异于这种家庭普遍的存在,也惊异于它的相对稳定性。我眼中的现代家庭,本应该是家人相伴相依、享受着天伦之乐的,退一步说,至少是家庭成员共同生活、互帮互助、共渡难关的。在历史上,家庭有过多种不同形式,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家庭在形式上有很大差别,但共同的是,血

缘、婚姻和共同居住却一直是构成家庭关系的三种最为基本的要素，它成了家庭的本质表征。因此，家庭被看作是由血缘关系、婚姻关系和共同居住关系构成的社会共同体，它们的变化反映了社会的变迁。在今天，人类家庭走向核心化、小型化的同时，家庭成员间的情感支持已成为联系家庭的重要纽带，如帕森斯把现代社会家庭看作是抚育子女和培养亲密情感的单位，而在许多著名的西方社会学家那里，夫妇式小家庭一直被描绘成“无情世界中的避难所”。家庭所具有的一种稳定而亲密的同居关系，为子女成功地社会化提供了必要条件，同时也是夫妻感情培养和精神寄托的所在，是人们自我发现和自我实现的恰当场所。人们面对日益异质化的社会、复杂的人际关系，尽可能找寻这种可以终身依赖、提供支持、给予温情的小家庭作为安全的港湾、退身之所，家庭实际上成了情感的共同体。然而，这儿的农民家庭却是徒有家庭的形式和外壳，并不具备共同生活的本质内容，家庭成员年复一年处于分离、情感交流不畅的状态。家庭的维系更多的是依靠经济利益，因而更多地呈现出经济共同体的特征。这种家庭具备了现代家庭的核心化、小型化的外型，却同时保留了传统家庭的一些实质内容。

韦伯认为，研究对象的选择通常取决于研究者个人的研究旨趣和主观好恶，而在社会科学的研究过程中却应该尽量保持客观性和价值中立，避免个人情感因素的介入。出于对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的关注和同情，我对他们的家庭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想以此作为自己研究的起点。“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为什么这种家庭会普遍存在？它具有哪些特征？农民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家庭模式？他们又是怎样在中国的制度结构体系的约制下调适和建构自己的家庭关系并同时也重塑制度结构的？带着这样的问题，我重新审视这种现象。表面上看，家庭成员的分散流动（或者说单个家庭成员的外出就业）是导致家庭结构变动、成员分离的直接原因，因而有半流动或流动家庭之说。但若深究，为什么家庭成员要外出而不呆在家里，要分散流动而不是举家流动呢？何况中国一向有“安土重迁”的乡土观念和文化传统。那么，引起农民分散流动的原因实际上成为这种家庭结构形成的关键。这也成为分析这一家庭现象的逻辑起点。

二、研究意义

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初，这是中外社会科学家尤其